



TITLE:

南潯・湖社與國民黨--南潯與近代中國之二

AUTHOR(S):

桑, 兵

CITATION:

桑, 兵. 南潯・湖社與國民黨--南潯與近代中國之二. 東方學報 2010, 85: 579-594

ISSUE DATE:

2010-03-25

URL:

<https://doi.org/10.14989/131772>

RIGHT:

南潯・湖社與國民黨

—— 南潯與近代中國之二 ——

桑 兵

【提要】明清以來，江南社會經濟繁盛，名鎮興起，浙江湖州吳興南潯鎮巨賈眾多，富可敵國。清季至於民國，南潯富商產業擴展到杭州、上海等地，又吸引各方各界人士與南潯結緣，並憑藉地緣、血緣、姻親、同學、師友、同業、同行等關係紐帶的聯結，對於全國範圍的政治、經濟、文化產生輻射影響。其中張、龐、周家等與新興政治勢力如同盟會國民黨的關係尤為緊密。1920 年代，湖州旅滬人士結成湖社，南潯富商在其中扮演要角。隨著國民黨掌握全國政權及其權力核心轉移到江浙集團，作為地方同志而非同鄉團體的湖社成員相互資緣，在國民黨內日趨顯要。而湖社成員彼此關係的好壞，也成為影響國民黨內派系之爭的重要因素。由此反省，化大為小的區域研究和分門別類的專門研究，或不免用了外來的觀念，使得中國社會內在的普遍聯繫及其整體性被割裂肢解。

1970 年代以來，中國研究中區域研究逐漸流行。其背景除了因為中國幅員廣大，差異明顯，難以籠統概論外，也受到域外學術背景的影響，好將中國區隔為相互獨立的地方社會。而近代以來所謂地方，無論政治學還是社會學意義，均與中國原有本意及實情相去甚遠，容易產生隔義附會。因此在強調一個地方內部的聚合及其獨特性的同時，往往忽略其與外部的廣泛聯繫，甚至分區本身也有著強烈的主觀後認色彩。中國歷史上不斷分分合合，使得各地方在形成和具有一定特性的同時，與其他各地保持廣泛密切的聯繫，須由整體觀照局部，不宜僅從地方性視角來認識。

上述情形，對於中心城市的研究尤為重要。清代至民國，若干城市乃至市鎮因地理位置、財富積累、文化傳承等因素，成為人才凝聚地，不僅形成區域中心，而且因為地緣以及由此產生的血緣、姻親、同學、師友、同業、同行等等關係紐帶的聯結，對於全國範圍的政治、經濟、文化產生輻射影響。如清中葉的揚州、19 世紀前期的廣州、後來的上海等。大都會以外，一些小城鎮由於特殊的歷史及社會原因，尤其是城鄉分界並非截然的社會結構，地位影響也遠遠超越地方乃至區域的範圍。清季民初的江南名鎮，在富甲一方的

基礎上，不斷張大勢力，浙江省湖州吳興南潯鎮，即個中翹楚。

諸如此類的城鎮在歷史上扮演的角色及其所起的作用，僅僅用社會經濟史的框架考察，容易流於見樹不見林，盲人摸象，各執一偏，難以認識完整清晰。而鄉土歷史的寫作，取材不夠嚴謹，坊間傳聞與史事記錄相混雜，不易取信。南潯與近代中國，牽連層面廣泛，絕非單篇論文可以討論充分。十年前所撰《先鋒與本體的衝突——壬寅潯溪公學第二次風潮述論》（《中華文史論叢》2001年第3輯），以南潯潯溪公學的風潮為中心，探討相關各方對於新式學堂及學生期許的異同以及由此而生的矛盾衝突，藉以顯示南潯在近代新式教育創興和學生群體意識發蒙中的先驅地位。本篇則以湖社為軸，主要展示南潯與國民黨的人脈淵源和政治影響。

一 南潯與國民黨

南潯鎮位於浙江省北部，湖州市東部，屬太湖流域和杭嘉湖平原，距上海、杭州均為120公里，距蘇州51公里，與江南名鎮震澤毗鄰，與另一名鎮同里也相距不遠。南潯屬湖州，近代以來，湖州屢次改名吳興。辛亥光復，一度設市。現在設湖州南潯區，轄數鎮，區政府設於南潯鎮。南潯建鎮750年，明萬曆至清代中葉為繁榮鼎盛期。清代江南有四大名鎮之說，南潯曾為四大名鎮之首，與同里、黎里、震澤齊名。

清代南潯鎮號稱“煙火萬家”，但據今人研究，很可能包括周圍鄉村。有確切統計資料的清末新政縣以下各選舉區的戶口調查，已不可見。1920年代後期，由於絲業衰落，南潯的社會經濟地位迅速滑落，人口也漸趨減少。1929年吳興縣第三區分為6鎮27鄉，南潯鎮因戶口眾多，分為運河上鎮、運河下鎮、南東鎮、南西鎮、東北鎮、西北鎮等6個鎮，計有4223戶，19889人。到1948年秋南潯鎮公所的戶口調查，鎮區有3300戶，13030人。而1953年南潯鎮共有12446人，其中非農業人口11730人，農業人口716人。¹⁾

不過，南潯的人口並不能作為其社會地位和實力的指標，因為南潯富商眾多，許多人居住在上海。據報導，清末鎮上各家共有汽船百餘艘，以便往來上海。南潯歷來絲業（蠶絲業和繅絲業）發達，“耕桑之富，甲於浙右”，以至於有“湖州一座城，勿及南潯半個鎮”的諺語。憑藉中國近代最大的絲商群體（或稱湖商、潯商），南潯在清末成為巨賈雲集的全國蠶絲貿易中心。晚清全鎮十分之六以上的農民以紡經為業，絲經行最盛時達56家。清末民初，南潯有絲棧42家。上海的91家絲經行中，70%為南潯人開設。道光二十七年（1847），上海口岸蠶絲出口總數為21176包，其中南潯出口13426包，占出口總數的63.3%。同治九年

1) 游歡孫：《近代江南的市鎮人口——以吳興縣為例》，《中國農史》2007年第4期。

(1870)，中國蠶絲出口五萬擔，光緒十八年(1892)出口超過十萬擔，其中大部分還是南潯輯里絲。²⁾民國元年至23年(1912～1934)，輯里絲出口平均占上海出口生絲總數的38%。1929年開始，出口數直線滑落，1934年跌到僅300包。

在絲業發達時代，南潯富商憑藉雄厚財力，向其他行業擴展經營。其實南潯各富本來不僅依靠絲業起家，也涉足軍火、買辦、鹽業等領域，並發展房地產、典當業、銀錢業。後來則多投資於近代交通、工業、銀行、地產等。所興辦的現代企業，仍以絲業(縐絲、絲織、絲綢)為主，兼營造紙等，並參與鐵路、航運、銀行、保險等行業。有的還涉足上海娛樂界、商場和體育場。僅銀行證券方面，南潯富商創辦或參與的就有，1907年11月，劉錦藻、張澹如、龐元濟、張鈞衡、周慶雲、張弁群等參與創辦浙江興業銀行。1909年，張靜江在上海創辦通義銀行。1913年，張靜江、周佩箴等在上海創辦中華實業銀行。1920年，周佩箴、張靜江、張澹如在上海與虞洽卿等創辦上海證券交易所，周任常務理事，張任監事。1924年，大陸銀行於南潯設分行，龐惟錫為首任經理。劉錦藻參與創設浙江鐵路公司並任副總經理，張鈞衡(石銘)、張寶善、周慶雲、蔣汝藻為董事。

小民對於宮禁富家，好奇心重，而難得實情，因此坊間傳聞甚多，以便發揮想像。關於南潯富商的發跡及其財富數量，最令人歎為觀止的是四象、八牛、七十二狗之說。所指為以財產為標準的富商等級。1930年代劉大鈞所著《吳興農村經濟》稱：“財產達百萬以上者稱之曰‘象’，五十萬以上不過百萬者稱之曰‘牛’，其在三十萬以上不過五十萬者則譬之曰‘狗’。所謂‘象’也，‘牛’也，‘狗’也，皆以其身軀之大小，象徵絲商財產之巨細也。”³⁾到林黎元寫《四象八牛：南潯絲商十二家族》，變成“資財在銀洋五百萬元以上者為‘象’，一百萬元以上者為‘牛’，十萬元以上者為‘狗’”。⁴⁾近年來，更加放大為“四象”身家在千萬兩兩以上，“八牛”百萬兩兩以上，“七十二狗”三十萬兩兩以上。號稱總財富達到八千萬兩，相當於清季政府一年的收入。劉大鈞已經指出調查與傳聞不無出入，齊東野語，難以為據。如家產百萬以上者不止四家，四象當中，劉、張身家均超過一千五百萬兩，又稱象中之獅。八牛的邢、邱、梅、謝等家產也超過百萬，與四象的龐家相近。此外，各級的列名排序，今昔也有所不同。⁵⁾因為事不可考，以至於樊樹志所撰《江南市鎮：傳統的變革》，關於四象八牛之說，只能照錄劉大鈞的文字。不過，劉大鈞當年並未親自前往調查，所屬中國經濟統計研究所派去的人員，因時間緊迫，取材不易，很難深入。雖然書中舉出家財隨時

2) 求良儒：《近代浙江絲綢業民族資本的發生與發展》，《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32輯，第63頁。

3) 劉大鈞：《吳興農村經濟》，中國經濟統計研究所1939年，第123-124頁。

4) 林黎元：《四象八牛：南潯絲商十二家族》，《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32輯，第30頁。

5) 樊樹志：《江南市鎮：傳統的變革》，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此書系1990年出版的《明清江南市鎮探微》改寫本。

代變動以及財產秘事非局外所能知兩大原因，後來鄉土歷史研究者還是對其相關論述不以爲然。⁶⁾

南潯地方歷來富庶，因而文風亦盛，入仕者多，從宋至清共出過 41 名進士，明代即有“九里三閣老，十里兩尚書”之諺。據統計，宋、元、明、清時期，潯籍京官 56 人，明、清兩代任全國各地州縣官的有 57 人。南宋至民國，在全國有影響的潯籍學者達 80 餘人之多。晚清至民初，南潯暴富，除擴張商業產業之外，也承襲傳統，因緣時會，向政治、文化等領域發展。受清廷文治思想和疆臣提倡學術的影響，清代商人頗重文化，以儒商爲標的。南潯富商子弟，以揚州等地商界風氣爲楷模，好著書、繪畫、收藏、器物鑒賞等事，名家輩出。著述如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龐元濟著《虛齋名畫錄》、周慶雲《鹽法通志》，繪畫以在北京成立中國畫學研究會的金紹城聲名最著，其兄弟姊妹及子侄中善畫者爲數甚多。藏書在劉承幹嘉業堂之外，南潯其他有名於時的藏書樓還有：劉桐建的眠琴山館、蔣汝藻的密韻樓、張均衡的六宜閣、周夢坡的夢坡室、嚴元照的芳苻堂，龐元濟的半畫閣等。

以遺老自認的劉承幹在學界交遊廣泛。1916 年，劉承幹在上海建立淞社，《學樵自訂年譜》記：“翰怡與周湘舫（卽南潯八牛之一周慶雲）主淞社，集者藝風、子頌、鞠裳、息存、梅庵、叔問、桔農、元素、聚卿、積余、金粟香、錢聽邠、吳倉碩、劉謙甫、王旭莊、劉語石、汪淵若、戴子開、金甸丞、惲孟樂、季申、瑾叔、崔磐石、宗子戴、潘蘭史、王靜安、洪鷺汀、陶拙存、朱念陶、褚禮堂、夏劍丞、張孟劬、姚東木，迭爲主客，與乙庵論文”。⁷⁾該社成員大都海上聞人，他們政治上未必認同劉承幹的遺老情結，文化上則大都傾向於堅守固有文化，憂心政治的改朝換代導致學術文化的一味棄舊圖新。

與偏好文化事業者的取向有異，南潯商家的從政之路，更加傾向於趨新，因而大都走了革新甚至反清革命之道，也由此與國民黨結下善緣。南潯與政界的關係，一方面由於南潯對外部趨新人士的吸引力，更主要則是南潯人士對於國家乃至世界潮流的積極感應和主動關注。以前者論，南潯學務發達甚早，原有潯溪書院於 1898 年改制，增加時務、策論，請湯壽潛出任山長。1900 年改由蔣觀雲繼任，又增加西學課程。1902 年，該書院與明理

6) 今日一般“四象”爲劉、張、龐、顧。“八牛”爲邢、周、邱、陳、金、張、梅、邵。“七十二墩狗”，包括南潯的四鄉。在鎮上的有：邱茂泰、邱蓋茂、邱義昌、邱德升、沈淦記、沈永昌、沈永豐、沈天長、李恒德、李萬順、李德茂、吳晉昌、吳其昌、吳永記、朱寵茂、朱廣隆、莊恒慶、邢豐記、卜同昌、韓怡昌、桂致和、潘泳記、潘大順、張豐泰、張恒豐、徐世興、徐惠和、許仁昌、謝森元、劉通德、龐同順、丁昌記等，多數是開設絲綢行致富。四鄉有北小圩張家、橋下張家、吳樓張家、斜橋（土門）金家、五家亭盛家、石匠（土門）邱家、七里村溫家、子嘶灣陳家、藏谷橋王家等。

7) 袁英光、劉寅生：《王國維年譜長編》，第 194 頁。

學塾合併為潯溪兩等小學。一說蔡元培亦曾擔任山長。1902年，龐青城創辦潯溪公學，聘請杜亞泉（後來《東方雜誌》主編）任總教習，葉瀚（1900年中國國會書記，後北京大學教授）、邵力子等為教習，學生當中有後來的著名報人黃遠庸，關係人則有蔡元培。⁸⁾張弁群1903年創辦正蒙學社，所聘教師有後來為北京大學教授的沈士遠、沈尹默兄弟，學生則有朱家驊⁹⁾、葉楚傖等。1906年，張弁群仿上海愛國女校先例，創辦潯溪女校，其時秋瑾剛好因留學生風潮從日本歸國，經浙江革命黨人敖嘉熊介紹，充潯溪女校教員。¹⁰⁾南潯人士因此與中國近代教育關係匪淺。1923年，張增熙子張乃燕當選浙江省教育會長。1925年，張乃燕被任命為國立廣東大學校長。1927年11月，兼任中央大學首任校長。

以後者論，與新興政治勢力關係較深者，當屬四象的張、龐兩家以及八牛周家。光緒三十二年（1906）11月，預備立憲公會在上海成立，周慶雲、蔣汝藻、張增熙、張澹如為會員。宣統元年（1909），浙江省諮議局成立，龐青城出任議員。張靜江、張弁群、龐青臣、周佩箴、周柏年等，都是老同盟會員，長期從事秘密革命活動，辛亥並參與上海、杭州等地的光復起義。張靜江作為國民黨元老，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內歷任要職。1924年1月，張靜江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後相繼任廣州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浙江省主席等。周柏年也曾做到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秘書長。另外周佩箴的長兄周頌西曾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交際部副部長（部長為瞿秋白）。“七十二狗”之一吳樓張家的張廷灝，則在1924年毛澤東辭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組織部秘書後接任毛的去職。¹¹⁾

不過，南潯因商致富，參與政治，也要發揮所長，貢獻財力。雖然事出隱秘，說法不一，不易徵信，也還有進一步擴張資料的空間。民初戴季陶記《龐青城事略》，資訊直接得自龐氏本人，所錄較為可信，其中提及龐氏為革命事業捐助的就有以下各事：

1906年冬，楊篤生（毓麟）發議收回《神州報》館，募資三千元，慨然應之。

1907年，加入革命同盟會。孫中山鎮南關之役，接濟軍餉五千元。冬，聞同志張□□為劉光漢所賣，被逮，以三百金延辯護，不及。

1908年秋，與張靜江共設東益昌票號，欲為革命金融機關。

8) 參見桑兵《先鋒與本體的衝突——壬寅潯溪公學第二次風潮述論》，上海古籍出版社《中華文史論叢》2001年第3輯。

9) 一說朱家驊曾入潯溪公學，誤。1907年夏正蒙學社停辦，朱家驊改進南潯公學。胡頌平：《朱家驊先生年譜》，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年，第3頁。

10)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65頁。一說推薦人為蔡元培或褚輔成。

11) 陳永昊、陶水木主編：《中國近代最大的絲商群體：湖州南潯的“四象八牛”》，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8頁。此書及《南潯金家》，均由陸劍先生寄贈，特致謝忱。

1909年，捐萬金，倡辦《民呼報》，以于右任爲主任。夏，赴日本考察商務，聞右任因載虜魯寶熙惡事被逮，促歸，以四千餘金延辯護士，始延右任出獄。

1910年春，東益昌號爲經理李燧生（非同盟會員）盜吞巨款十四萬，從此破家資之半。

1911年春，廣州黃花崗之役，以千金濟之；嗣聞敗衄，同志七十餘人死之，悲憤欲狂。武昌起義後，以五千餘元接濟。金陵軍隊舉事，因無器械，致爲張勳所敗。冬，押家屋得三萬金，助藍天蔚北伐軍餉。

1912年春，同志組織同盟會本部於上海，捐資千。

龐家雖然位居四象第三，實際財產總數不過160萬兩，而且多半還歸其兄龐元濟（萊臣）掌管。除資助革命活動外，龐青臣還先後創辦潯溪公學、述志醫院等新興事業，資助馬相伯創辦復旦公學，以及開辦青城造紙廠，能夠動用的活錢有限。有鑒於此，戴季陶不禁贊道：「喜安惡危，人之常情，處和平之局，而致力於危險之事，非有卓識者，其孰能之哉。……吾鄉中人抱革命之思想，而得列於健兒班中者，以南潯之張靜江、龐青城爲最早。……青城以富家翁生長於華屋之裏，未能如靜江之乘風破萬里浪也，而始則從事社會事業，繼則投身革命團體，不惜毀家以促成共和之新國焉，可謂人傑矣。」¹²⁾

由於富商背景以及善於理財，南潯人士從政多擔任財政要職。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龐青城任實業部商政司司長。中華革命黨時期，張靜江任財政部長。1928年2月，國民政府設立中華民國建設委員會，張靜江任主席。周佩箴於辛亥杭州光復後即出任浙江省官產處處長。1923年1月，周佩箴任國民黨財務部副部長，歷任廣東省政府委員兼土地廳廳長，廣東沙田清理處處長，黃埔商埠公司執行委員，上海中央銀行籌備主任，財政部杭州造幣廠廠長，審計部主任秘書兼總務處處長，以及中央銀行、中國農民銀行、亞東銀行、交通銀行等多家銀行的常務董事、總經理、董事長等職。張乃燕也擔任過中華民國建設委員會副主席。

南潯富商及其子弟政治上趨新，大約由於幾種因緣，其一，出國遊歷遊學，張靜江、張弁群、龐青城、周柏年等曾分別前往歐美、日本經商考察或留學，沐浴文明風氣，接受嶄新思想的洗禮。其二，南潯各家相互結緣，同鄉之外，還有種種親友關係，張靜江即分別介紹兄長張弁群、舅舅龐青臣和親友周佩箴等加入同盟會。其三，居住在上海等大城市，思想開通，交遊廣泛。能夠接觸各種趨新事業及人物。上述關係也間接影響其他湖州人士，張靜江、龐青臣、周柏年等即緣此結識聯繫陳其美、戴季陶、朱家驊等人。

12) 天仇：《龐青城事略》，《民權報》1912年5月8-9日。

二 湖社與南潯

民國時期中國有兩個湖社，成立時間相近，均與南潯關係密切。一是由南潯金家的金城（1878－1926，原名紹城，字拱北，號北樓，別號藕湖漁隱）所辦中國畫學研究會演變而來的湖社畫會。中國畫學研究會1920年5月成立於北京，實際創辦人應為金城，為取得北京政府的支援，舉周肇祥為會長，由金城主持會務。1926年9月，金城病故，其子金開藩與周肇祥意見不合，率部分金城弟子另組畫會，取名湖社畫會，以紀念金城。該社會址仍設於北京，後相繼在全國各城市設立分會，並出版《湖社月刊》。亦可稱為北湖社。¹³⁾近年來近代國畫歷史的研究頗受關注，湖社畫會成為重點之一。

相比之下，本文著重探討的另一湖社，顯然尚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即使近年來湖州和南潯的歷史頗為地方人士所注目，相關書籍也少有論及。只有郭緒印主編的《老上海的同鄉團體》（上海文匯出版社2003年）第十章“湖州商幫及湖社”，有較為完整地概括記述。另外方福祥撰文論述過《上海湖社的抗日救國活動》（《上海志鑒》1995年第4期）。而此湖社不僅成立時間早於彼湖社，影響湖州地方乃至全國政局也更為深遠。

關於湖社的緣起，戴季陶在《我對湖社的感情和對湖社的希望》中說：“去年湖州的同鄉諸君，偶然閒生出一種活動的意識來，發起湖社這一個團體。剛剛這一件事的發生，適逢其會，我也在上海，並且發起湖社的諸位同鄉當中，有不少是我的親友。於是互相援引，我也列名於湖社的發起人。後來湖社成立，大家不嫌我是一個萍水浪人，推我為職員之一。”¹⁴⁾據湖社1925年3月29日大會主席所做的第一年社務報告，該社“自去年六月一日成立以來，迄本年三月份止，為期十月。但本社發起實肇始於去年三月三十日倚虹樓之會議，迄今日止，適滿一年。”¹⁵⁾

據此可知，湖社雖於1924年6月1日在上海正式成立，可是兩個月前已經開始籌議。相關報館對此有所報導，1924年3月31日《申報》稱：“旅滬湖人，鑒於湖州地方及旅外湖人情形渙散，為謀建設起見，擬組織湖社，特於昨日下午三時，假座倚虹樓，開發起人會。當推戴季陶為主席，報告開會宗旨，通過草章，並推出籌備員楊譜笙、陳靄士、戴季陶、陳果文（夫）、周由廩、湯濟滄、潘公展、嚴濬宣、周越然等九人。惟因戴君即須離滬，故由次多數沈田莘遞補。散會已六時餘云。”¹⁶⁾同日上海《民國日報》也刊登了文字完全相同的消息。¹⁷⁾這些報導顯示，倚虹樓會議不僅明確決定組織湖社，通過了該社的草

13) 陸劍：《南潯金家》，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9－63頁。

14) 《湖州月刊》第2卷第1號，1925年4月1日。

15) 《本社第一年度之社務報告》，《湖州月刊》第2卷第1號。

16) 《旅滬湖州人組織湖社》，《申報》1924年3月31日。

17) 《旅滬湖人組織湖社》，《民國日報》1924年3月31日。兩報各有個別誤植。

章，而且推舉出了籌備員，應是一次正式的籌備會，而非一般所謂務虛的神仙會。

《申報》和《民國日報》均未即時報導湖社正式成立的情況，6月4日，《民國日報》以《湖社之緣起與簡章》為題，報導了該社成立前後的相關資訊：“旅滬湖人發起之湖社，日前開成立大會，通過會章，選出委員二十一人。聞定七日下午四時，在辣斐德路臨時通信處開第一次委員會，互選理事，討論社務，業已發出通告。又聞該社社員並不限於旅滬同鄉，凡屬湖人贊助該社旨趣者，均所歡迎。”

根據大會通過的九條簡章，湖社的旨趣為“謀湖屬六邑及旅外同鄉事業之發展”，包括：主持正義，研究建設事業，促進地方自治，扶助民眾教育幾方面，進行方法有調查、研究、講演、出版、實施等項。組織方面，凡湖屬六邑同鄉，不論男女，贊成該社旨趣，志願協助社務，由社員二人以上介紹，並經理事會通過者，均可為社員。由社員選舉委員21人組成委員會，由委員互選理事7人組成理事會，並互選主席理事1人；理事及委員任期一年，可連選連任。理事會可任用辦事人員，並制定辦事規程。職員均為榮譽職。該社每年三月開大會一次，報告前年度的社務和決定本年度的社務，並選舉委員；每月開理事會及委員會一次，處理社務；大會未及議決之事務，得由理事會決定，必要時可開臨時會。會所暫設於上海。

湖社成立後，發展相當順利。1924年6月成立大會時，該社共有社員114人，到1925年3月首屆年度大會，已經擴展到237人，翻了一番。以後逐漸增加，達1000餘人。¹⁸⁾委員會分為總務、交際、經濟、調查、演講、教育、出版等七部，出版《湖州月刊》作為機關刊物，並於1924年底租定上海聖母院路慶順里9號為社址。一年中理事會共開常會10次，臨時會1次，委員會開常會11次，臨時會2次，出版委員會開會2次。理事會、委員會的各項辦事規程，均已議決公佈。1925年3月29日在北京路宋家街聯誼會舉行的第一屆常年大會，到會的社友及男女來賓共300餘人，濟濟一堂，盛況空前。¹⁹⁾

湖社“緣起”稱：“吾湖州自古蒼人文之秀，建邑挽江浙之樞，稻粱既盡美於東南，蠶桑更著名於世界，苟能合作以圖功，允見質文之並進。乃湖山黯淡，人事浮沉，值茲國步之阽危，益見鄉情之渙散。溯厥緣由，略可屈數，蓋吾湖屬同鄉，里居鮮自衛之機能，旅外乏協助之組織，貧困無告，俊義莫登，水利不修，交通尤梗，實業則尚遏新機，教育則自封故步。綜茲叢脞，彌切隱憂，循是以還，與人曷競。是則因團結之力未堅，提倡之道未至，遂令已成之局徒事因循，更新之謀不容延緩也。用願糾集同人，組成湖社，本自治之旨，謀公益於鄉，言乎私，則砥礪名節，不為勢利所轉移，言乎公，則黽勉事功，悉以

18)《湖社歷屆社員人數表》，郭緒印主編：《老上海的同鄉團體》，第646頁。該表數字有些出入。

19)《本社第一年度之社務報告》、《社務報告（三月份）》，均見《湖州月刊》第2卷第1號。

正平爲職志，群策群力，任怨任勞，下奮鬥之決心，作民治之先導。坐而言，尤貴起而行，始自今日，由一鄉更推及一國，作此初基。”

表面看來，湖社不過普通的旅外同鄉聯誼組織，與清季以來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各地同鄉會並無二致。但事實似乎並非如此簡單。湖州旅滬人士，早已設立了“湖州旅滬同鄉會”，只是活動一直不振。就在湖社成立前夕，湖州旅滬同鄉會曾經醞釀改組。1924年2月10日，爲舊曆正月初六，該會舉行新年團拜，嚴濬宣鑒於“年來對於會務，未嘗進行”，提議改組。2月17日下午二時，在海甯路湖州會館召開同鄉大會，“推舉起草員，修改章程，以便重振旗鼓”。張靜江、陳靄士、楊譜笙、嚴濬宣、戴季陶、張蕊英、余寰澄、王均卿、張君謀、湯國梨、湯濟滄等11人聯名發表宣言，聲明發起改組之旨趣：

“同人等鑒於湖州旅滬同鄉，生聚日繁，事業日增，苟協濟共進之團體，不能乘時進行，決難樹自助助人之基礎。而原有湖州旅滬同鄉會，徒具章程，洩漫陳言，無俾實用，常年大會及改選職員諸大端，旅滬同人，亦不常聞見，會員又久不擴充，甚非所以應時勢之需要也。爰集同志，發起改組，以期固結團體，融洽感情，本會員平等財政公開主義，圖謀旅滬同鄉三育之進步，各業之發展，及協濟事業之改進，庶幾會務煥發，同鄉交受其益。”²⁰⁾

是日會議，推舉起草員11人，實到爲楊譜笙、王一亭、潘公展、湯濟滄、凌銘之、嚴濬宣、陳果夫、沈聯芳等8人，“即席起草章程，大致就緒”，並定於24日召開第二次會議。²¹⁾可是第二次開會時，只有楊譜笙、潘公展、湯濟滄、嚴濬宣、陳果夫等5人到場，周慶雲（湘齡）、沈聯芳、黃潛臣等人有事他往，其餘亦未到會，結果因不足半數，只好延期到3月1日。²²⁾起草員的消極，反映了他們對於改造和利用同鄉會組織意見分歧，這很可能成爲另組湖社的重要契機。

湖州旅滬同鄉會成立於1906年，發起人爲南潯八牛周家的周慶雲和沈聯芳等，是上海最早成立的同鄉會之一。1910年，周慶雲又和王一亭、沈聯芳等集資在上海建湖州會館，並任總董。1924年，南潯旅滬公會成立，周慶雲任會長。²³⁾湖州會館建成之後，湖州旅滬同鄉會反而久同虛設，很少活動。1923年冬，湖州旅滬同鄉鑒於會館只管“送死”的事情，發起改組之說。對於改組湖州旅滬同鄉會，沈聯芳表示反對，²⁴⁾周慶雲也並不情願。或者說，他們的改組目標及方案，與其他人士有所差異。表徵之一，周慶雲沒有參與湖社

20)《湖州同鄉會行將改組》，《申報》1924年2月17日。

21)《湖州同鄉會繼續開會》，《民國日報》1924年2月23日。

22)《湖州同鄉會會章起草續志》，《申報》1924年2月25日。

23) 陳永昊、陶水木主編：《中國近代最大的絲商群體：湖州南潯的“四象八牛”》，第116-117頁。

24) 華：《湖州旅滬同鄉會糾紛的歷史》，《湖州月刊》第3卷第1號，1926年5月15日。陳果夫曾編輯《湖州旅滬同鄉會改組紀錄》，該文有所參照。

的籌組，第一屆湖社委員會由潘公展、楊譜笙、陳藹士、周由廬、陳果夫、戴季陶、湯滄、嚴濬宣、張君謀（乃燕）、周越然、鈕師愈、沈田莘、周頌西、邵叔嘉、張靜江、湯充土、張廷灝、李伯勤、沈士華、陳希曾、范霞軒等 21 人組成，周慶雲沒有列名其中，南潯人士也只有張靜江、張君謀、周頌西、張廷灝等 4 人。

按照戴季陶的說法：“我們這個湖社，本來是由一般同鄉的人，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裏組織起來的。當時大家的注意點，就是看見湖州人太無團體，即使有團體，也是只爲死屍作事，不爲活人作事。所以想大家團結起來，組織一個爲湖州活著的人作事的團體。這一個黎明的觀念，就是湖社的原始的意義。及到既經發起，幾個同具這種黎明的觀念的人，大家才把爲活人做甚麼事的條件，假設了幾條起來，作爲湖社意識的表現，這就是湖社章程上面所規定的職務了。”²⁵⁾ 這應是將湖社與湖州旅滬同鄉會做一分別，找出在湖州旅滬同鄉會繼續存在的情況下湖社設立的價值。

湖社雖然號稱由湖屬六邑人士發起組織，實際上開始社員幾乎都是吳興籍的，《湖州月刊》的論著，十九也是論及吳興社會，以致有讀者來函批評太過片面，“社既以湖州爲名，那麼對於六邑的情形和事業，應有均等的調查和發展。”希望湖社“以後多徵求各邑的社員，一切建設事業，亦須普及各邑。”²⁶⁾ 潘公展代表湖社和《湖州月刊》回復解釋道：“我們的目的，自然要求六邑的同志都加入湖社協力進行，自然要希望六邑的事業平均發展。可是在起初的時候，除了吳興一邑外，外邑的同志很少加入，或者他們不曾知道的緣故。”並告以已經採取措施，“總期社員的品質並有進步，使六邑的人士都把湖社看做一種切己的事業。”還邀請來函者加入湖社，幫助發展會務。²⁷⁾ 不過，現狀看來改變不大。1932 年該社吳興籍社員達 1090 人，超過總數的百分之九十。²⁸⁾

南潯爲吳興乃至湖州之首，無論從南潯在湖州的地位，還是南潯富商在上海的實力來看，湖社初期職員的比例都顯得不相匹配。果然，湖社 1925 年度大會選舉的 21 位委員當

25) 戴季陶：《我對湖社的感情和對湖社的希望》，《湖州月刊》第 2 卷第 1 號。關於湖州旅滬同鄉會爲死屍不爲活人做事之說，1925 年 9 月，《湖州月刊》第 2 卷第 6 期刊登署名“嘯”的文章，《我在入湖社前的一段事：“湖州旅滬同鄉不會”的談話》，有極爲生動的描述。作者自稱是極喜歡結團體的湖州人，去年底經過上海，聽說旅滬同鄉創辦了湖州同鄉會，專門前往拜訪。不料到處找不到。好不容易碰到鄉人，才知道同鄉會開辦一年，連會長會董也沒有選出來，且未開過一次會，只是出了會費。尋到同鄉會後，沒有人在，也沒有職員可以找，一位在場的老者問以是否買棺材，如果是，趕緊去找沈聯芳。後來找到也是同鄉會員的舊同事張君，據說該會由幾個真心辦同鄉會的人和幾個實在不要同鄉會的人一起辦事，結果春天雙方鬧意見，打了一場筆墨官司，真心辦會的人一氣之下，甩手不管，不要同鄉會的人反而管會，所以永遠不開會，可謂“同鄉不會”。真心辦會的人於是組織湖社。

26) 《上海大學王宇春君來函》，《湖州月刊》第 2 卷第 2 號，1925 年 5 月 1 日。

27) 《復函》，《湖州月刊》第 2 卷第 2 號。

28) 郭緒印主編：《老上海的同鄉團體》，第 646 頁。

中，南潯人士增加到 6 位，除原來的 4 位委員外，周佩箴、周君常也當選為委員。²⁹⁾《湖州月刊》則由張廷灝擔任主編。

不過，由於政見和文化觀念差異，南潯人士在湖社與湖州旅滬同鄉會之間有不同的喜好取捨，周慶雲、龐萊臣、劉承幹等留在湖州旅滬同鄉會，而周佩箴則左右逢源，兩面參與。而在湖社內部，南潯的張靜江等人與吳興陳氏一脈，也不無各自的利益考慮。這為後來湖社人士在國民黨內的爭鬥埋下伏筆。

三 湖社與國民黨

湖社自稱是同鄉聯誼組織，按照《湖社月刊》所說：“對於本鄉各種事業，持研究改進之方，下正確無偏之討論，貫輸世界學識，以期我湖人感奮有為，而副湖社創立之旨趣。”³⁰⁾可是，與湖州旅滬同鄉會並存，湖社應有更加清楚的自我定位，而不僅僅是人脈的分歧。“緣起”宣稱的以自治謀求民治，由一鄉推及一國，可以窺見端倪，但仍然有些模糊。戴季陶的《我對湖社的感情和對湖社的希望》，專門就此提出討論，他認為，一定要從觀念的團體意識走向概念的團體意識。湖社一經成立，黎明的觀念便成過去，“如果沒有更充實的內容，把團體的意識，用精確的概念完成起來，我們湖社，便會生不出自由意志，就是不能有獨立的意思和行為。再換一句話說，就是不能具備團體的人格。”一個團體由觀念的團體意識進到概念的團體意識時代，必須戰勝道德的和智識的魔障。為此，他提出從湖社成立第二年起應認定兩點：“一、湖社現在還沒有概念的團體意識，大家要為造成概念的團體意識，用十二分的力量。尤其以確定最高概念，為現在唯一的必要。二、在概念的團體意識未成立以前，大家須覺悟我們的團體，還是未成年時代，以團體的名義對外主張，須持貢獻參考資料的態度，不持政策宣傳的態度。團體內須增多研究的組織，俾團員互相訓練。”

雖然戴季陶將概念集中在“把地方事業是甚麼，怎樣才會發展，怎樣去發展，發展來做甚麼”等命題之上，但是明確提出：“為甚麼要組織湖社？組織湖社的目的，當然含有要使湖社成為‘有概念的團體意識的團體’的意義在。我們湖社，雖然是地方的團體，卻是地方的同志團體，不是地方的同鄉團體，所以我們目前大家應該要努力做第一項的功夫。”期望十年之後，即 1936 年，“我們湖社已經能夠成為對內對外都具有獨立的意思和行為的團體”。並且宣稱：“如果大家今天不認定這一個努力的分際，不努力先做內修的功夫，我恐

29)《社務報告（三月份）》，《湖州月刊》第 2 卷第 1 號。

30)《本刊招請各埠代銷處》，《湖州月刊》第 1 卷第 6 號，1925 年 3 月 1 日。

怕湖社的生存，不能夠久遠，即使久遠，也不能具生存的意義。連我自己對湖社的興味，也會漸漸減少至於消滅。”³¹⁾

將湖社由地方同鄉的團體變成地方同志的團體，並且要確定為最高概念，顯然並非湖州地方所能範圍，而勢必與其他地方的同志發生聯繫。尤其 1920 年代的中國，正是各種政治勢力大角逐的時代，戴季陶雖然希望以團體的名義對外主張暫不持宣傳的態度，可是湖社定有演講的義務，並且決定 1925 年要從事宣傳。作為同志的團體，對外宣傳必有所本。奉湖社之命到湖州進行宣傳活動的潘公展，所講題目即“國家主義與中國”。他說：“中國自革命以還，十三年來，政治日趨黑暗，民生日益憔悴，干戈擾攘，盜匪充斥。頑固之徒，遂認革命為多事，詆共和為弊政。但諸君須知中國之所以演成今日之現象者，非革命之罪，而實革命尚未徹底之罪，非共和之患，而實共和未盡瞭解之患。換言之，十三年來之中國，名為共和，名為中華民國，而實則民也國也，依然打成兩橛。……惟其為國家主人翁之國民，概置國事於度外，而後外人、軍閥、官僚、劣紳、土豪、軍隊、盜匪乃得交肆其毒。”在他看來，“欲救今後之中國，不得不服一劑根本培補之藥，即提倡國家主義是也。惟有提倡國家主義，始可以振作國民愛國之心，亦惟有人民真能愛國，而後如願引國事為己任。國事糾紛迎刃而解，胥賴此焉。”

與一般的國家主義不盡相同，潘公展所謂國家主義救中國的“唯一主旨，在以種種方法，陶冶吾中國固有之國民性，維繫吾中國國民間固有之情感，發揚而光大之，以脫於亡國滅種之境而已。”必須先有平民的革命，推翻一切軍閥的勢力，根據民意組織民治的政府，才能制定對內對外的根本政策。“故歸根結蒂，提倡國家主義以救中國之方法，其最初之手段，非盡力於宣傳事業，使國民瞭解國事之必待於國民自決，起而為平民的革命不為功。”³²⁾這顯然是為行將發動國民革命的中國國民黨製造輿論。則湖社與國民黨志同道合，引為同志，在地緣的紐帶之外，更有政治紐帶相聯繫，其由一鄉推及一國的國，也就是要推翻北京政府，建立真正的中華民國。

不僅如此，湖社的發起還與國民黨內的權力中心在地緣上由廣東轉向江浙相契合。這樣的轉移，一方面是國民黨權力代際交替所引發，另一方面，也和國民黨逐漸統一全國的趨勢相適應。由於湖州出來的人才眾多，相互援引，進入政壇，隨著蔣介石的江浙集團地位上昇，湖社成員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中舉足輕重，戴季陶的期望果然如願以償。1934 年，湖社舉行成立十周年紀念大會，蔣介石、林森、吳鐵城、張群、邵力子、張靜江等國民黨要員送來匾額。蔣介石手書：“桑梓敬恭、忠烈永式。”吳鐵城稱其“發揚民治”。邵力

31) 戴季陶：《我對湖社的感情和對湖社的希望》，《湖州月刊》第 2 卷第 1 號。

32) 潘公展：《國家主義與中國》，《湖州月刊》第 2 卷第 1 號。

子稱其“含閎廣大，爲民前鋒”。1935年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時，湖社有10人當選爲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其中陳果夫、陳立夫、戴季陶、張靜江、褚民誼、潘公展、朱家驊、徐恩曾等長期是湖社的核心人物。湖社爲此聲勢顯赫，成爲上海最有影響的同鄉團體之一。³³⁾劉大鈞撰寫《吳興農村經濟》時即注意到：

“今日吳興在國內所處之地位，並不減於昔曾盛極一時之湖州。蓋往日以‘富甲東南’聞名全國者，今日吳興人士在政治上學術上占重要之地位，亦頗爲當世所推重也。鼎革以還，吳興人才輩出，或輸財助餉如張人傑氏，或獻身革命如陳其美氏，……至今除張人傑氏現任建設委員會委員長外，考試院院長戴傳賢氏，國民政府主計處長陳其采氏，實業部部長吳鼎昌氏，江蘇省政府主席陳果夫氏，中委陳立夫氏，浙江省主席朱家驊氏，前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氏，上海市社會局局長潘公展氏，均系知名之湖州人士。……然則今日以衰老若湖州，猶彰彰印人心目，殆地以人善聞者歟？”³⁴⁾

所舉大都湖社成員。所以有論者注意到，湖社實爲有別於會館、同鄉會，帶有政治色彩的地域性社團。³⁵⁾

在前期湖社，陳其采（鬻士）一直擔任主席委員或委員長，其他人則分別擔任各部工作。儘管他們與國民黨結緣並非由於湖社，可是湖社畢竟爲他們提供了一個相互聯繫的經常性紐帶，進一步增強了彼此的關係，並使之在國民黨內可以相互援引。小小湖社的成員竟然能在權力爭奪激烈的國民黨中央佔據重要位置，絕不僅僅憑藉個人的單打獨鬥。

不過，地緣關係在向外作用時可以鞏固彼此聯繫，卻不能保障內部的和諧一致。進入國民黨權力高層的湖社成員，由於所處位置不同，爲了各自的利益，也不時展開明爭暗鬥。張靜江擔任浙江省主席期間，即先後與陳果夫、朱家驊發生衝突。同是湖社主要成員的陳果夫、陳立夫兄弟（CC派）與朱家驊之間的鬥爭尤爲激烈。朱家驊早年受惠於張靜江，又與周柏年有戚誼，與南潯關係較深。抗戰期間，同鄉兼同門的朱家驊與二陳，因爲輪流執掌國民黨組織部和國民政府教育部，用人行事相互排斥，遂成水火不容之勢。

朱家驊與二陳的派系矛盾，儘管雙方在公開場合一再否認，實際不僅普遍存在，而且相當嚴重。朱家驊派在國民黨內的整體實力不足以和CC派對抗，不得不與其他派系聯合，但在文教界，尤其是大學系統當中，朱家驊卻能憑藉較好清譽，有著相當深厚的根基和廣泛的人脈。抗戰期間，國民黨開始在各大學普設區黨部，³⁶⁾而此時剛好朱家驊接任國民黨

33) 參見《老上海的同鄉團體》。

34) 劉大鈞：《吳興農村經濟》，第126頁。

35) 郭緒印主編《老上海的同鄉團體》論及湖社與會館、同鄉會的聯繫和分別，定義爲“資產階級性”的同鄉自治團體。

36) 關於戰時國民黨在大學的組織發展，詳見王奇生《戰時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以西南聯大爲中心》，《歷史研究》2006年第4期。

組織部長，與二陳的位置互換，雙方一方面在新掌控的系統中排斥對手，一方面力圖利用新的權力資源和原有的人脈關係維持甚至擴張在舊系統中的勢力，組織部系統朱家驊派改變 CC 派舊軌，教育部系統則 CC 派排擠朱家驊的人脈，雙方的矛盾日見尖銳，衝突愈演愈烈。而大學為雙方利益交叉重合最大的領域，各自都視為禁脔，於是成為兩派爭奪的焦點。

1944 年 5 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十二中全會，朱家驊與二陳互換組織部和教育部職位，此舉引發兩大系統人事的重新洗牌，進一步加劇了兩派的衝突，各自在自己掌控的領域內加速排擠對方人馬。³⁷⁾ 據 1944 年 8 月 7 日王子壯日記：“近日政治風氣日壞，蓋生存競爭激烈之表徵。朱驍先自組織部去職，其所屬人員相繼為新任所汰，彼所主之中英庚款董事會已決定裁撤，中央秘書處所管之文化驛站，系朱之親信賀師俊所主持，中央秘書處以緊縮名義併入宣傳部。余豈非支持此等機關者，其待調整亦為事實。惟朱氏甫下臺，紛紛出此，實不免打落水狗之譏。在朱氏僚屬，非【均】不免有走投無路之悲。此種現象，惟有使壁壘日深，衝突激烈，為黨國前途計，實堪憂慮。”³⁸⁾

王奇生以西南聯大為主的研究表明，抗戰期間，國民黨改變戰前基本不在大學設立基層黨組織的做法，使得國民黨在大學教職員和學生當中勢力迅速擴張，掌控了局面，中共地下組織的活動能量有限。直到 1945 年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出人意料地通過決議，撤銷軍隊黨部和學校黨部，並相繼關閉了全國各學校的黨部，中共在大學校園的活動日趨活躍，兩黨在大學裏的局勢才迅速發生逆轉。³⁹⁾

撤銷學校黨部，由蔣介石向國民黨代表大會提出：“本黨在軍隊中原設之黨部，一律於三個月內取消；在各級學校以內，不設黨部，三民主義青年團改屬於政府，擔任訓練青年之任務；在六個月內，後方各縣市與各省臨時參議會，應依法選舉，俾成為正式民意機關；制定政治結社法，俾其他各政治團體得依法取得合法地位；本黨黨部在訓政時期所安理有國家行政性質之工作，於本屆代表大會休會後，陸續移歸政府辦理。”⁴⁰⁾ 1945 年 5 月 18 日，國民黨第六屆代表大會通過了“促進憲政實現之各種必要措施案”，取銷軍隊和學校黨部，三

37) 關於兩派在國民黨內的爭鬥，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第 13 章《“六大”前後的派系政治與精英衝突》論述最詳。馮啓宏《〈蔣檔〉書翰中的國民黨派系傾軋》（《民國檔案》2007 年第 1 期）引述陳果夫 1942 年 6 月 12 日給蔣介石的密告信，提供了更直接的論據。

38)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王子壯日記》1944 年 8 月 7 日，第 9 冊，第 317 頁。

39) 王奇生《戰時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以西南聯大為中心》，《歷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另參見金以林《戰時國民黨教育政策的若干問題》，楊天石、黃道炫編：《戰時中國的社會與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 年，第 1-27 頁；桑兵《1948 年中山大學易長風波》，《學術研究》2008 年第 1 期。

40) 1945 年 5 月 30 日《解放日報》。

民主義青年團改屬於政府，後方各縣市參議會依法選舉，制定政治結社法。此舉看似為實行憲政做準備，實則背後顯然有如何抑制 CC 派和朱家驊惡鬥的潛因。六大開幕之際，CC 派與其他各派的權力爭奪進入白熱化，並且鬧到蔣介石面前，蔣介石不得不採取斷然措施，化解矛盾當然不可能，退而求其次，只好儘量緩解或回避衝突。但如此一來，國共兩黨對於大學師生的影響很快乾坤顛倒，使得大批所謂英美派教授迅速左傾。他們對國民黨完全失望，而對共產黨未必瞭解，其倉促間所作權衡取捨，在導致國民黨對大陸的統治崩潰瓦解之後，也增加了與中共之間磨合的困難。

四 結 語

由於南潯的財富積聚與社會聯繫，近代中國各個層面的許多事情往往與南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其間的糾葛，有時甚至影響決定黨派國家的命運。這些無限延伸的複雜關係，依照現行學術分科的觀念孤立地看，或許無足輕重，整合為全局，則顯現彼此呼應的態勢，輻射能量大增。由此可以引申討論如下幾點：

一、地方或區域社會研究的興起，本有二義，其一，中國幅員廣闊，區域差異明顯，難以籠統而論。縮小範圍，旨在求得確切觀照。其二，研究層面下移到基層社會，以便全面把握整體。但實際進行時，多由科際整合，分門別類，主要是社會經濟史、市鎮史之類，不能揭示區域社會各個層面的內在聯繫，演變為下層社會或社會經濟研究，整體性反而更加喪失。

二、流域經濟孕育的富庶地區，形成樞紐，輻射面寬，聯繫和影響超越地方界域。南潯人士在湖州、蘇杭、浙江、上海乃至全國，佔據政治、經濟、文化界的許多要津，其身份亦城亦鄉，亦商亦農，不宜僅以區域、鄉村等眼光視之。所謂城紳與鄉紳，因人因時而異。而且某籍士紳，從本地到縣城省垣乃至京師，官紳連為一體。清代官制實行避籍，督撫以下各級官員，若不能與當地士紳關係融洽，一旦產生糾紛衝突，往往遭到同籍旅外官紳的攻擊糾參，不安於位。中國歷史長期分合交替，文化大小互滲，因此，研究中國問題，須具體而貫通，不宜隔斷以放大。

三、中國為倫理社會，尤其重視人倫關係，如血緣、地緣、姻緣以及衍生而來的同窗、同年、同事等紐帶聯繫。這是理解中國社會的關鍵，不宜簡單批判。南潯地方小而繁盛，各家各有所長，互相結緣，多為血親姻親，如劉家與蔣家、張家與龐家等。這不僅有利於提昇各自的地位，也使之利害相關，結為整體，並通過各種形式的團體結社進一步擴張，影響及於全國。

四、區域史、地方史、城市史、市鎮史等等的研究，存在見事見物而不見人的偏差，忽略了歷史的中心還是人，而人的活動並非機械，所以歷史是社會有規律運動與人的有意

識活動的統一。和揚州富商一樣，南潯因富而文而政，吸引各方人士，影響此後的言行。如朱家驊與 CC 惡鬥之際，倚重沈兼士等人，不僅與北大淵源，也與南潯有關。南潯人士的活動範圍擴大到蘇杭滬，結交面大幅度擴展，社會聯繫進一步延伸。在此平臺之上，無論政治風雲如何變幻莫測，其社會地位和身份仍然維持相對穩定。龐青城之女龐蓮嫁給康有為之子康同凝，相當典型地體現了近代中國變動的詭譎。展開各個世家的關係網，令人匪夷所思的聯結層出不窮。

五、湖商的衰落，學人多從株守絲業或經營保守著眼。實則經濟轉移固然為要因，但中國商人與政府或政治關係過密，以學術文化為尚，以及諸子析產制的存在，也是導致其富有難以長期延續的癥結。揚州鹽商、廣州行商、山西票號的命運大體相似。即使新興產業的民族資本，不被拖垮的反而是異數。況且湖商傾注甚巨的上海等地房地產，也是受近代社會政治風雲詭譎的影響，暴起暴落，因而損失慘重。